

博士咖啡

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的故事

《财经界》杂志社 / 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www.economyph.com

博士咖啡

——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的故事

《财经界》杂志社 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士咖啡：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 / 《财经界》杂志社编.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4

ISBN 7-5017-5923-5

I. 博… II. 财… III. 经济增长—中国—通俗读物
IV. F1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749 号

书 名：博士咖啡——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的故事

作 者：《财经界》杂志社 编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夏鸿 (电话：68354371)

责任印制：常 毅

封面设计：白长江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开 本：A5

印张：10

字数：204 千字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书 号：ISBN 7-5017-5923-5/F·4773

定 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53507 68341876

68341879 68353624

序 言

刘 鹤

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已发展起来了，2002 年 GDP 的增长率是举世瞩目的 8%。在目前总值 32 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中，虽然中国只占约 4%，然而在积弱的全球气候下，中国缔造的增长相当于 2002 年全球 GDP 总增长的 17.5%——增长贡献仅次于美国。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确实越来越大。而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如何能保持持续的繁荣，本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从总体上来看，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仍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于存在一系列的落差：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之间、地区经济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而这种落差导致了有市场创新力和强烈利益的企业主体不断地发展。所以这个时期可能是充满调整、动荡和局部震荡的阶段。稳定会压倒一切，但在局部，无论是地区、产业或收入群体都会经历比较痛苦的调整。其实在地区结构的调整、城市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对非国有经济的确认，在发展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职能定位等方面已经有许多新的举措出现。

今年政府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这对经济增长也会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毕竟在一个



大国的经济中仅仅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非常有限的，关键是要能启动民间投资。一方面政府要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为重要的就是能启动民间投资。而在发挥民间投资作用的同时，也确实要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因为中国毕竟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的阶段，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怎么看待政府的作用。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将从直接的运动员转为裁判员和环境的制造者。政府要作为一个有远见的预见者来指导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监管者来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无论是从去年还是过去几年以来经济发展情况看政府都做了很多的调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我相信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这对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的作者是赵晓、巴曙松、高辉清、钟伟4位年轻的学者，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有锐气、有思想的锋芒。他们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中国财政危机、石油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中国金融风险、银行上市、中国证券市场再造、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城市化等问题的分析可以说都是一时的热点与焦点话题。相比一般个人研究，他们的选题明显地更加广泛、思路更加宏阔、反应更加快速，体现出专业互补、分工合作的优势。由于他们所选择的话题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所以文章一经面世，每每引起社会的关注、媒体的重视以及同行的极大兴趣。本书就是“博士咖啡”4学者对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报告的集中，相信读者定会有收获。

点评咖啡

20 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民众享有了百年来难得的繁荣和福祉。中国已经拥有 20 多年的繁荣，中国还能期待未来 20 年的繁荣吗？

布热津斯基说，我认真阅读了可以得到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前景的文献，又与中国人打了将近 1/4 世纪的交道。我相信，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出发：即中国国土广袤，不容忽视；中国历史悠久，不容藐视；中国雄心勃勃，不容我们对其想当然。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保持着独特的历史延续性，有全球 20% 的人口，以及日益增长的自信，她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性角色。

但为未来 20 年的中国着想，我们还需要新思路，就是必须确立一个战略中心，即政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中心；而战略手段则是两个基本点：一曰保障公民的产权；二曰保障公民的教育权。

大国的兴衰在历史交响乐中不过是飘散的音符，而人类将第一次面对拥有这么多人口的国度之崛起，的确显得意义非凡。



咖啡正浓

中国经济：如何造就未来 20 年繁荣

已有和期待的繁荣

中国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充满了缔造繁荣的玫瑰色氛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确比以前要好得多。但改革开放也非一帆风顺，几度沉浮几多危难，才走到今天。1978 年~2000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达到 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 3 倍。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 6 经济大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344 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6280 元，提高了 17 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134 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2253 元，增加了 16 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则分别是当年的 4.77 倍和 3.49 倍。而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充溢着积极向上的气氛，大学生们朗诵着青春万岁，憧憬着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政府则励精图治，其间各种改革，暗合了“圣人常无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策略，执政者乐意以民心为己心，其出台的政策，从农业的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星火燎原，莫不从善如流。

中国今后 20 年会如何？人们充满着乐观情绪。

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未来 20 年的中国经济做了种种预测，林毅夫教授认为，美国“能长期维持 3% 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 30 年左右的 8% ~



10%的快速增长。如此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体。李京文教授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2010年，经济增长保持平均8%的高速度；第二阶段是2010年~2030年，经济增长保持在平均6%的水平；第三阶段是2030年~2050年，经济增长维持在平均4%~5%的水平上，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和实力均将迈入世界前列。王小鲁博士的分析结论是：从2001年~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4%，其中，2001年~2010年为6.58%，2011年~2020年为6.22%。

解三明博士等的研究结论则是：在“十五”期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而2006年~2015年间，可维持7%或略高的经济增长。

外国学者甚至比我们更乐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世界经济：历史与未来》中这样描述：在整体作为现代化迟到者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飞上云霄；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紧随其后；中国则已经登上了21世纪的新航班，它将开辟新的航线，并且一飞冲天。甚至有人还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赶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认为目前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按此推论，中国GDP在20年内将超过美国。即使按名义GDP计算，假定目前中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万亿美元和9万亿美元，增速分别为8%和3%，则中国GDP大约在47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我们可以做粗略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维持在7~8%



的增速。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3.4%，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9%，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0%。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中国以赶超者的姿态，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或者说，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排在美、日之后居世界第3位。如果中国足够幸运，则在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经济大国，但在本世纪内超过美国则困难重重。

中国真的将在21世纪初期或中叶重新回到鼎盛的巅峰吗？且慢！以上种种推算隐含着中国享有持久的繁荣的假设，但，繁荣会弃我们而去吗？

中国能否期待另一个20年的繁荣？繁荣背后的种种稳定因素正在悄然浮现。中国已经走过的20年，是以“翻两番”和“不争论”为基调的渐进改革，这样的纲领已经延续了20年，即使在“十五”计划中，也不过延续了2010年再实现一个翻番的思路。但20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

国有与民有的现实

民富，然后国强。中国经济20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国家财富和资源的占有形式，已绝非“国有”这两个字可以形容，各种产权占有形式，尤其是私有产权占有形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沿用两个简单的公式来讨论中国资源占有情况的变



迁。

公式一： $GDP = \text{最终消费} + \text{资本形成} + \text{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 。

最终消费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为举足轻重的，改革开放20年来，消费率始终稳定在58~60%。在1978年时，全社会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8~80%的份额，政府消费占20~22%，20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政府的膨胀速度几乎同步于经济发展速度，而若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实际上是“大政府、小市场”的僵化格局的话，则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在精简臃肿的政府机构方面，我们所获的进展不大，这仍然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一块“硬核”。



在居民消费中，城市居民的消费却绝对地上升了，在1978年~1987年的10年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以上（同期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82%下降为75%）；在1988年~1997年的10年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的比重勉强维持在50%左右（同期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75%下降为71%）；而目前，农村居民的份额已经下降为不足45%（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约为63%）。上述数字粗略地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并无任何缩小的迹象，城镇人均消费水准始终较之农村高2.2~2.5倍，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相当之快，原来的农村人口并非通过滞留在农村致富，而是拜城市化之福泽。

资本形成是中国经济的第二大引擎，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投资率也长期稳定在36~40%。资本形成中包含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鉴于存货投资的规模仅为固定资本投



资的 5% 左右且其来源构成数据不足，因此我们不妨直接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构成。在 1980 年的时候，国有、集体、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分别为 82%、5% 和 13% 和 0%；到 1990 年转变为 66%、12%、22% 和 0%；到 2000 年转变为 50%、15% 和 14% 和 21%。国有经济在固定资产形成中的地位缓缓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国有经济的产出占 GDP 的比重不足 40%，则无疑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效益欠佳。

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似乎难以驱动经济增长率，尽管仅以对外贸易规模/GDP 的指标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20% 以上，似乎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相当高，而事实上剔除掉中国仅仅挣了一点加工费用的加工贸易部分，再剔除掉中国不断增长的进口商品和服务，则净的货物和服务对 GDP 的贡献率大体维持在仅仅 3% 左右，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半壁江山”，而国有和民营经济则分别为 30% 和 20% 左右。

因此从公式一来看，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但私人部门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公式二： $GDP = \text{劳动者报酬} + \text{生产税净额} + \text{固定资产折旧}$ 。

这个公式很难确切地反映出中国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如果将生产要素粗略地分为劳动、土地和资本，那么劳动者报酬中也许可以大体反映出劳动的收益，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也许可以大致反映出资本的收益，但土地的收益却难以准确地反映。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至今，中国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和土地的占有结构如



何？收益分配结构如何？这样极其重要的、勾勒中国经济运行轮廓的工作尚未完成。

在此我们只能引用樊纲教授的“中国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基本格局研究”的初步成果。就劳动这个要素而言，大约 GDP 的一半成为劳动者报酬，“按劳分配”仍然是中国财富分配中重要的特征。但百姓的财富并不全部来源于双手的“活劳动”，在人均 4498 元的收入中，靠双手劳动所得是 3959 元，而靠储蓄、证券投资等“物化劳动”带来的资本收益是 538 元，因此可以说大多数国人的“有产程度”还是很低的。

就资本这个要素而言，目前个人资产是 231975 亿，国有资产是 98859 亿，集体企业资产是 33576 亿，法人财产是 33610 亿，外资为 32259 亿，因此，全部社会资本占有中的比例分别为：个人 54%、国家 23%、集体和法人分别为 8%，外资为 7%。在资本收益占有方面，个人为 6817 亿、国家为 2965 亿，集体和法人分别为 3516 亿和 2729 亿，外资为 249 亿。因此，全部社会资本收益的占有情况是：个人 37%、国家 16%、集体和法人分别为 19% 和 15%，外资为 13%。资本收益占有超出了资本占有比重者包括集体、法人和外资，而资本收益占有低于资本占有比重者是国家和个人。鉴于集体财产和法人财产是难以说清楚归属的财产，因此总体上，每年个人有 3145 亿、国家有 1295 亿应得而未得的资本收益不知所终。就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占有而言，目前土地乃至自然资源这一块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分级所有。和土地相关的房产资源中，公有住房为 64562 亿，私有住房为 97390 亿（城市私房为 59835



亿，农村私房为 37555 亿。) 因此，从要素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有不再是最重要的产权安排和占有形式。

汹涌的失业洪流

作为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百姓有没有饭碗是相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管仲曾经说，衣食足知荣辱，仓廩实知礼节，而孔子则说民以食为天。如果百姓食不果腹，时处饥馑之中，还去侈谈什么政府改革、社会安定？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共创造了 1.7 亿多个就业岗位，从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在 1980 年的时候，国有、集体经济提供的就业份额分别为 78% 和 22%；在 1990 年时这个比例转变为 62% 和 21%；在 2000 年时转变为 38% 和 7%，就业岗位越来越依赖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但失业浪潮仍然十分汹涌，就业压力重不可抑。如何估计中国的失业状况？

第一种测算口径是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至 2001 年底，就业人口为 7.3 亿，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 3.6%，估计 2002 年登记失业率将上升至 4.5% 左右。这个指标几乎和中国的失业真实状况无关。

第二种测算口径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上下岗职工人数。2001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国企下岗职工共 1400 万人，约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 5.8%。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600 万人，全国大概有 2000 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 8.3%。但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从 1998 年～2001 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 2500 万人。应该注意到，这些下岗人数，



还只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者，并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者。

另据《瞭望》报导，在 1996 年~2000 年间，国有及集体企业在职员工共减少了 4800 万人。由此推算，包括集体、三资和民营企业等在内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员工规模比国有企业还要稍多些。因此即使乐观估计其中的一半人已经重新就业，则城镇至少有 2500 万人等待饭碗，相当于从事城镇经济活动总人口的 10.2%。这已经十分接近失业率 12% 的国际警戒线了。

第三种测算口径是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 4.7 亿，全国耕地 19 亿亩，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 10 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 1.9 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 1.3 亿，有 3.2 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 1.5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到 2001 年底，中国从业人员为 7.3 亿人，其中城镇为 2.40 亿人，占 32.8%；农村为 4.9 亿人，占 67.2%。因此我们计算的结果是：中国城镇失业率为 10.2%，农村失业率为 30.6%，全社会从业人员失业率为 23.8%。

从需要“饭碗”数量来看，在“十五”期间，全国需就业人数约 1.62 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 3000 万个就业岗位，期间企业自然减员最多每年可腾出 1000 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未来 5 年中国每年必须创造出 2000 万个岗位。此外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将在未来 10 年内从 7.13 亿增加到 7.81 亿的峰值，此后可能缓慢下降，但到 2020 年仍有 7.75 亿。



从可能提供的“饭碗”数量来看，有两种算法，第一种算法是以创造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品数量来衡量。以目前 GDP 年均 7~8% 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量大约是 7、8 千亿，一个城镇人口就业大约需要 13 万元左右的资本品，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在城市创造出 500~600 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未来 20 年中国若以吸收城镇人口为主来解决失业问题，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第二种算法是所谓就业弹性系数，目前对中国就业弹性的估测为 0.10~0.17 左右，这样 GDP 每增长 1%，可增加 70~100 万个就业机会。而按照 7~8% 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 0.17 测算，未来 20 年中国劳动力总需求将从 5.76 亿增长到 7.41 亿，而如前文所分析，此时劳动力总供给为 7.75 亿，这也就是说，未来 20 年中国始终面临汹涌的失业洪流。

滚滚而来的就业大军将持续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年的压力？至少 20 年。应对失业洪流，是一项难以完成但却不能不完成的任务。现在迫切需要政府对就业形势充分认识和转变思维，毕竟吸收一个城镇人口就业需要数 10 万计的配套资本品；而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制造业就业，所需要的资本品投资大约在 2~3 万；若进入城市服务业就业，则资本品可能少到只需要几千元。惟有兼顾城镇和农村双双存在的就业压力，并且深刻意识到农村数亿人口无所事事、无以为生的状态不加速缓解将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将 8% 左右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向农村倾斜投放，才可能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来。

由于目前城镇人口比率以年均 1.8 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上升，未来 15~20 年间，就业红灯警戒难以解除，失业洪



流的疏浚，其实质是城乡人口比例由现在的 3:7 转化为 7:3 的过程，也是城乡之间森严的高墙坍塌的过程，更是政府施政纲领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充分就业的渐变过程。

悬河危局的城乡分割

中国地大，农村差别也大，目前中国农村所经历的“空洞化”随处可见。

导致城乡之间差距相对拉大的原因，在于近 5 年来“三农”政策方面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体制复归，农民负担日渐沉重。现在的农村是妇孺老弱相守望着，青壮劳力去打工，村子空空洞洞的没有生气，地被撂荒的也不少。

我们的测算表明，在 1985 年农民人均负担的农业税大约 5 元，此后每 5 年翻一番，目前大约人均 40 多元。加上农民要缴纳人头费（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还有义务工摊派等等；如果要进城，则需要缴纳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农民的人均税费负担大概在 100 多元了！考虑到农村人均纯收入至今不过 2250 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主要依赖于非农的打工收入，则向农民征收税费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理解。

在 1978 年~1984 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总共约 600 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 1985 年~1994 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 4000 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7 年之后，农村经济体制出现严峻的“复归”趋势，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和社会救济体制等趋恶，农民负担日重，农村金融基本干涸。当资源被从